



邓稼先与杨振宁的不同回归路

同窗多年,选择不同

少年时代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,弹玻璃球,甚至还比赛着爬树。上中学时,杨振宁比邓稼先高两级,同在北平崇德中学,后来两人又一同读了西南联大。解放前夕,邓稼先和杨氏兄弟赴美留学。获得博士学位后,邓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,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存着。

1956年10月,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发表论文,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,很快名噪一时。次年,两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折桂诺贝尔物理学奖,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。这一年,杨振宁35岁,邓稼先33岁,李政道31岁。

此时,邓稼先已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了7年。就在昔日同窗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年,邓稼先的人生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。1958年8月,时任二机部(核工业部)副部长的钱三强,对邓稼先说:中国要放一个“大炮仗”,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。这个“大炮仗”,就是原子弹。

1971年杨振宁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。下飞机后,开列了

2月21日,杨振宁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,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报道引发热议。一谈到杨振宁就避不开邓稼先。1950年,两人高度重合的人生道路,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叉口。他们一个选择回国工作,最终成为中国“两弹”元勋;一个选择留下继续从事理论研究,很快成为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。



1957年,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(左1)李政道(左2)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

他要见的人的名单,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。自1971年以后,杨振宁多次回来访问、讲学。邓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。有一次,他们一道去北海仿膳,大家边吃边谈笑着,杨振宁对邓稼先说:“这回你可以吃饱了,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,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!”回想起这些往

事,杨振宁与邓稼先都笑了。

身体里循环着中华血液

1985年,国家首次给“两弹”科研队伍颁奖,整个团队的奖金总数为1万元。受奖机构自身又拿出一部分钱,按照10元、5元、3元的级别分下去。邓稼先当时拿到了最高的奖励级别。但也就

是在那一年,邓稼先因患直肠癌住进了医院。

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写的回忆录,里面有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。

1986年,邓稼先由于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渗血,已经达到无法救治的地步。邓稼先病重住院期间,杨振宁去医院探望时,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。

杨振宁问:“研究原子弹,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,值得你把命都搭上?”

邓稼先:“原子弹十块钱,氢弹十块钱。”

邓稼先的这一回答让常年居住于美国的杨振宁顿时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2015年4月1日,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,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。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,是一个给了他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。但对于回归,他说:“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,是中华文化的血液。我94岁了。很欣慰,多年来,为了帮助建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曾做过一些努力。”

综合新华社、《环球时报》、观察者网、橙新闻

“老子”曾是老人自称

老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位,乃道家学派的创始人,道教尊他为太上老君。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对人的尊称,相当于夫子、先生。但老子作为称谓,一开始则是老年人的自称,相当于老夫。其出处有:1.《后汉书·逸民传·韩康》:“此自老子与之,亭长何罪!”2.《晋书·庾亮传》:“老子於此处兴复不浅。”在这两本史书里,韩康和庾亮分别自称老子。

从老年人自称,老子又有了泛指老年人的意思。《江表传》里有:“足以惊骇老子(指曹操)否?”白居易也有《晚起闲行》诗曰:“幡然一老子,拥裘仍隐几。”

据《沈阳日报》

“鬼子”一词骂人连带父祖

“鬼子”一词始见于《世说新语》陆机晋斥卢志为鬼的儿子。对于“鬼子”一词,《辞海》的解释是:骂人的话。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:“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(陆机):‘陆逊、陆抗,是君何物?’……士衡正色曰:‘我父、祖名播海内,甯有不知?鬼子敢尔!’”对于这种侮辱,陆机自然要以牙还牙、针锋相对,骂卢志为“鬼子”恰恰是将卢志的先人也捎带着一起骂了——鬼的儿子祖上当然也是鬼了!

“洋鬼子”一词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。中国古代大多都用“蛮”、“夷”、“匪”、“贼”、“寇”等字眼形容“来犯者”。明清以来,我国沿海一带常受到日本海盗的侵扰,“倭寇”就是当时对日本海盗的称呼,明代还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戚继光。鸦片战争时期,英、法军队入侵中国,由于洋人的长相在当时人看来极为怪异,“洋鬼子”一词渐渐成为对外国入侵者的简称。清代陈康祺在其《燕下乡脞录》卷九中记载:“若鬼使,则出使外洋之员;以西人初入中国,人皆呼为‘鬼子’也。”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“给人穿小鞋”与三寸金莲有关

从南唐到清末,1000多年来,我国汉族妇女一直沿袭着缠足陋习,把脚缠成弓形,美其名曰“金莲”。“给人穿小鞋”这句俗语正是从三寸金莲说起的。

在封建时代,男女婚姻全凭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双方不得见面,怎知女方脚大脚小呢?所以,媒婆说媒时,都要女方的鞋样儿,请男方定夺。为防受骗,男方同意了婚事就留下鞋样,按照尺寸做一双绣鞋。如果当初故意把尺寸弄小,自然就穿着不舒服,甚至穿不上,就要丢丑。后来,人们把这种风俗逐渐引申到了社会生活方面,“给人穿小鞋”这句俗语,也就流传开来。

据人民网

古代打假:唐代3天内可退货

上古时期的周朝已经有假冒伪劣商品了,并且需要通过立法来打击。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,如果商品的尺寸、数量、颜色等达不到标准,就按“假冒伪劣”对待;假如食品还没有成熟,是不允许拿出去卖的,既为防止吃了中毒,也为打击以次充好的假冒伪劣行为;家禽牲畜和海鲜食品如果没有成熟,也绝不允许拿到市场上兜售。

唐朝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较为全面和成熟的时期,不但制度配套健全,而且法律规定详细,惩罚措施也比较严厉。《唐律疏议》上规定:一旦某种食物变质,已经让人受害,那么所有者必须将变质食物立刻焚烧,否则要被杖打90下。如果不毁掉有害食品,反而送人甚至出售,致人生病,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一年。如果这种食品致人死亡,食品所有者则要被判处绞刑。别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吃了本应被焚烧但未焚烧的有害食品造成死亡,食品的所有者也要按过失杀人来处罚。

唐代还有退货的规定,和现在的退货制度差不多。《唐律疏议》说,“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,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,都可以找卖方退货;卖方不退的,可以向官府举报,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,并‘笞四十’。”

到了宋朝,官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,商铺、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,并按行业登记在册,否则就不能经营。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,行会首领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,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。

综合新华网、人民网

1933年,韩立才还是家乡河北盐山县的一个小学教员,大哥韩立园在29军军务处工作,这年9月他去张家口29军军部看望大哥,在这里,他听到了“喜峰口大捷”的故事。在那之后,他也成了二十九军的一员。

“1931年‘9·18事变’中,日军兵不血刃占据了沈阳,此后的日子,如入无人之境地占领了东北。1933年3月,日军攻占了长城的喜峰口,29军奉命阻击。”72年过去了,韩立才仍然清楚地讲述出当时的背景。

29军是西北军的部队,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,西北军土崩瓦解,宋哲元、张自忠等将领群龙无首,张学良于1931

29军老兵回忆喜峰口之战

年1月把这些部队收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,宋哲元任军长,6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,全军两万多人。

1933年3月6日,宋哲元第29军奉命防守冷口迤西至马兰关一线的长城各关口。9日,日军步骑联合部队和伪军一部,乘万福麟部和29军三十七师交接阵地之时,向喜峰口外约20里的一个前哨据点孟子岭发起猛攻。傍晚,日军占领高地,控制了口门。王长海团以半天时间,前进100多里,从遵化赶到喜峰口。日军先头部队已占领口外东北方长城制高点,并有敌步骑500名向喜峰口冲击。

“大锅饭”毁掉八旗兵

□吴鸣

清顺治四年(1647),北京城共65.9万人,其中八旗近40万,加上奴仆共48万,到光绪年间,满汉内外城分治界限虽已模糊,但内城人口67万人中,汉人只有3.5万。旗人不能从事农工商等职业,只能当官、当差或当兵,靠“死工资”过活。

这份“死工资”究竟有多少呢?据记载,清代一品大员年薪是1.8万两,从九品小官是32两,比御用铜匠收入还低。官小俸薄,不足自养,所以政府每月还要发粮食,两者合称“钱粮”。当时粮食多从南方漕运而来,路途遥远,加上库房周转等弊端重重,下层官兵很难领到新粮,故有“旗人吃老米”的说法。

随着经济发展,人们对收入要求水涨船高,到光绪时,普通

步兵的工资已涨到每年17两,外加20斗米。“吃工资”队伍日益庞大,成了沉重的负担。此外,漕运自咸丰时便已不畅,粮食很难按时发放,只能折钱,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压力。

为应付财务危机,清末,政府只好乱发货币,引发了一轮又一轮通胀,导致银贵钱贱。咸丰时期,普通军人只能拿到六七成工资,其中一部分还是严重贬值的铜钱,甚至还有难以流通的铁钱。这给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

“大锅饭”毁掉了曾经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军队。据清末驻华的俄罗斯武官记载,当时,这些终身制的军人没有统一的军装,缺乏必要的训练,射击时不会瞄准,缺乏纪律性,站岗时甚至将步枪交给看热闹的老百姓玩,自己则躲到一边去晒太阳。其实,他们也是受害者,到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再次诏裁旗饷,最普通的旗兵每季发俸米一袋约155斤,月饷银一两。到清亡前夕,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。



晚清八旗弓箭手